

马克思需要理论视阈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研究

梁 豪, 王 瑄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摘 要:“需要”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需要呈现为驱动物质生产活动的原初动力,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动态平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马克思运用需要概念,说明了资本逻辑导致工人发展需要与资本增殖需要间的矛盾对立。基于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具有三重逻辑。历史逻辑维度,揭示需要升级与经济发展范式变革的互动规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催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理论逻辑维度,解蔽资本逻辑生产范式内部存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二律背反,人的发展需要推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现实逻辑维度,依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为满足科技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历史文化传承与文化产品消费的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需要、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需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马克思需要理论;物质生产活动;美好生活需要;出场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5)05-0073-09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基于苏杭两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门关于经济与文化双向贯通、双向融合的理论。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要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苏杭两地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后,并没有将这样样本研究的命题定义为文化经济学,而是界定为人文经济学。这表明,重点在于一个“人”字。众所周知,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人的活动,均以满足人的需要为首要目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514}是物质生产活动的感性要求,即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中介,人的需要得以满足。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唯物史观基本框架:“需要—生产活动—需要的满足”。当代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以经济活动方式展开。由此看来,人文经济学可被简要概括为:一门基于人的需要,以人文方式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学问。那么,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为满足人的何种需要而产生的理论?为解答此问题,本文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历程出发,探究人的发展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出场的现实依据。

一、马克思需要理论中“需要”的含义

马克思提及“需要”甚多,但并未详细界定,在不同语境下需要的含义也不尽相同。质言之,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存在语境性差异。那么,廓清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即为本研究的首要任务。综而观之,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主要包含两种语境: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需要概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需要概念。

(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需要概念

其一,需要具有历史性。人的需要驱动物质生产活动发展,而物质生产活动则是需要得以满足的中

收稿日期:2025-02-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CKS092)

作者简介:梁 豪(1974—),男,江西修水人,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介。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生存需要是其基础性需要。“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31} 一切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能够生存。正是在生存需要的驱动下,人们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生产出直接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或发展出获取这些资料的生产能力与工具。在满足生存需要、获得潜在生产力的基础上,新的需要随之不断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32} 通过现实个人的既得生产能力、既得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者的实际结合(亦即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要素的实际结合),创生出新的需要满足的对象。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个需要不断被生成和满足的过程。这一过程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中介,实现需要的创造与满足。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持续跃升,人的需要在层次与范围上亦持续扩展。因而,人的需要是“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2]524} 与此同时,人的需要又反过来要求物质生产活动与之相适应,推动社会生产出满足需要的物质资料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正是在人的需要与物质生产活动的这种辩证运动中,社会存在被永续地创造出来。

其二,需要具有层次性。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优先满足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在基本物质条件得到保障后,才逐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此外,不同层次的需要之间往往不可通约。当生存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试图以高层次需要替代个体的低层次需要,往往效果甚微。相反,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个体更倾向于追求精神层面的充实,如社会认同、自我实现与发展。如果此时仍采用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手段来激励个体,通常也难以奏效。然而,受个体差异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或意识形态导向的影响,人的需要满足并非总是呈现出线性递进模式。在较高层次需要未能充分满足或未被明确认知的情况下,个体可能将需要的满足回落至较低层次,或以低层次需要为载体,表达更高层次的渴望。例如,对社会归属和自尊的追求,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可能表现为对财富占有的执着或对基本物质资源的竞争,但这并不具有绝对性;拒领救济粮的朱自清,则体现了在基本生存需要之上对人格尊严与气节的坚守。由此可见,人文素养与社会个体的相互作用,事实上成为影响人的需要满足及其实现方式的重要因素。当物质生产活动达到一定水平后,人的较高层次需要并不总是依赖于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更倾向于通过社会人文环境的支持来实现,如完善的教育体系、可靠的安全保障、稳定的社会关系、诚信友爱的文化氛围等。这些非物质条件在满足人类更高层次需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三,以需要为中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自然需要作为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基础,具有“第一需要”的先存性。这种需要驱动人进行第一历史活动,即满足自然需要的劳动。但这种活动并不是单个人的活动,而是“无数现实个人在彼此交往中的活动,因而具有双重的结果:一方面,它使人的本质从逻辑潜在向现实存在转化(主体自然和客体自然被改造为人的自然);另一方面,它现实地建构了个人间交往的形式——社会关系”^[3]。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关系,更是内在于人的本质,即嵌入人类社会结构之中。一方面,生存需要驱动主体性创造,表现为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人又以分工协作的共同活动建构这种物质生产力,并以生产关系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此时,对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是对自然资源与生产工具的物质性需要;二是对共同活动形式的社会性需要。因此,当人面对自然时,这两种活动与双重属性同时发挥作用:他既感受到自身作为自然存在的受动性,又体验到通过社会方式自主建构或改造自然的能动性。由于需要的双重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人与社会化建构的自然之间的关系。质言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自然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者具有同一性。在此意义上,人与自然实现和谐共生。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需要概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需要概念,其核心在于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受异化需要驱使,劳动

如何异化。

其一,需要的现代有用性发生转变。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能否进入流通环节,成为资本逻辑生产的目的,取代了产品能否满足物质与精神需要这一初衷,以至于任何需要都成为获取交换价值的手段。对货币的需要代替了对产品使用价值的需要,一套以价值追求为原则的现代有用性体系由此建立。进而,在流通环节中,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导致难以量化的生态功能与审美价值丧失了经济可见性;抑或直接用于个人需要的劳动产品,由于不进入流通环节,同样被视为无价值的存在。需要的现代有用性转变说明,在资本逻辑的生产方式下,需要体系本身已经异化,对货币抽象价值的追求成为了衡量需要有效性的唯一尺度。

其二,资本的增殖需要。资本在流通中表现为:资本家投入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两者在一定的时空下结合,生产出可被社会承认的商品,最终通过在流通环节中销售,实现比初始投入更大的价值,并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货币“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4]346}。这意味着,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本质上来源于由人的需要所驱动的劳动,是一种积累的劳动。资本的增殖需要,归根结底还是对劳动的需要。由于资本家私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无法与任何生产资料结合创造财富,难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因此不得不出卖自己的活劳动来维持生计。以满足必要生存需要产品的劳动时间为界,马克思将工人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增殖的来源,资本的增殖需要由此得以实现。

其三,工人的发展需要。从需要的历史性来看,工人本应在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不断产生与满足中实现自身发展。然而,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劳动报酬仅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难以支撑更高质量与多层次需要的满足。同时,由于可支配时间相对有限,工人被迫将大量时间用于剩余劳动,无法充分关注和实现自身精神层面的发展需要。因此,工人的发展需要在这种结构下不能得到充分满足。马克思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共时性条件下,运用需要概念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

通过对马克思需要理论中不同语境下的“需要”含义的讨论,我们发现需要与经济发展范式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一,经济发展范式依托人的需要的时代性特点,而具有历史性;其二,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以扬弃旧的经济范式而得以确立;其三,经济发展范式以满足人的现实需要为根本导向。需要与经济发展范式之间的关联,对研究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具有重大意义。

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出场的历史逻辑: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具有不可还原的客观性,它根植于人作为自然存在的生物属性。人的生存必须通过外部物质交换维持自我生命体,这种生存论层面的根本矛盾构成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原始动力。即马克思所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286}正是为满足人的需要,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才创生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但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591}物质生产活动相较于其他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主导性地位与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始终立足于人的需要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水平,并以“物质需要—物质生产活动”这一框架展开其具体历史形态。

(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殖民经济遗产与战争创伤的双重困境,迫切需要维持国内经济循环与国家主权自主。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6]

基于中共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双重需要的张力,国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对经济基础进行了彻

底重构。农业集体化将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社会主义改造则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支配地位。通过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将社会剩余集中投向重工业领域,以快速构建保障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体系。计划经济体制在此阶段呈现出双重历史效应:一方面,通过统购统销与票证制度,实现了基本生活资料的公平分配,使新生政权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仍能维持社会大局稳定;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平均主义分配模式,也逐渐抑制了经济系统的内生动力。随着初步工业化目标的实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源于计划经济体制已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改革核心在于通过释放资本活力,解放被体制束缚的生产力。基于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7]

此后三十载,尽管物质文化需要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变化,且物质生产活动水平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有所不同,但这一阶段的经济范式始终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目标。资本逻辑在此阶段展现出矛盾二重性:一方面,它推动了物质财富的空前积累——中国在短短三十年间实现了从短缺经济到“世界工厂”的跨越;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需要体系的新一轮异化。当发展需要被窄化为GDP增速竞赛时,自然环境就成为资本增殖的“牺牲品”,传统工业区的生态灾难深刻暴露了“先污染后治理”模式不可持续的弊端。在社会领域,效率优先原则催生的“下海潮”与“下岗潮”,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纽带,消费主义浪潮也逐渐消解着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文化层面,历史街区的大规模拆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凋零,折射出资本对文化记忆的消极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8]当资本逻辑生产不断满足人的物欲时,人也在物的包围中逐渐迷失自身。

(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论断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已不再局限于物质文化层面,而是逐步扩展为对更高质量美好生活的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解释了“美好生活需要”的深刻内涵:“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9]。从这一论述中可以领会到,美好生活需要既包含物质文化需要,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需要,体现了人在更高层次上的全面发展追求。随着人的需要在新时代发生深刻转变,为适应和满足这些需要,物质生产活动也相应进行转变。其在理论层面表现为经济发展范式的理论转变。恩格斯曾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10]³² 经济发展范式的理论转变必然包括其理论术语的更新,习近平总书记将此理论术语概括为“人文经济学”。至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人文经济学,正是围绕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经济发展范式转型理论。这一转型植根于两个历史条件的成熟:其一,绝对贫困的消除使需要体系突破“生存—温饱”的物质阈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向生态宜居、文化认同、社会公正等多元维度;其二,传统发展模式积累的矛盾已达到临界点,倒逼经济系统进行价值重构。“从本质上看,它是基于新时代历史方位对中国式现代化示范样本的人文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文经济思想的当代表达,因而是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学。”^[11]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2] 这表明,我国已经成功走出短缺经济阶段,全体人民的吃喝住穿等生存需要已得到全面满足,物质供给实现了对社会全体人民的覆盖。物质贫困的彻底消除,奠定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确立的客观基础。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范式不再仅仅围绕生存需要的物质供给展开,

而是将更高层次的享受需要作为新的价值导向。“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曾经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方面,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13]伴随这一转变,人民愈发期望在更高层次和更高质量上满足自身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需要。质言之,新时代物质生产活动不仅重视劳动者作为生产主体的地位,更强调其作为价值主体的尊严与自我价值实现。这要求经济发展范式实现根本性转变: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向关注更高层次、结构化的需要,强调个体的主体性与多样化需要的综合性满足。同时,从以往以规模扩张为导向的数量型发展,转向更加注重品质和效益的高质量发展。正是在这一现实与理念的双重演进中,以满足人的高质量需要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应运而生。

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出场的理论逻辑:突破资本逻辑的困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运用“需要”概念探讨经济生活的内在驱动力问题:是资本增殖的需要,还是人的发展的需要?通过分析资本逻辑下这两种需要的张力,马克思在理论上勾勒以一种以“人文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范式,这构成了人文经济学出场的原初理论视域。

(一)资本增殖的需要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于现代工商文明的萌芽阶段,其中蕴含着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理论框架。我们尝试从马克思的思路出发,剖析后工业范式向人文范式转变的逻辑可能。工业范式以资本逻辑组织物质生产,资本的唯一目的即增殖自身。但资本自身不会发生增殖,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出更新更大的物质财富。因此,资本要实现自我增殖,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劳动者的物化劳动成果。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0]269}此时,劳动者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进入资本逻辑的循环中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通过劳动者的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被消费,其蕴含的价值则转移至劳动产品中,即劳动者的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劳动者所生产出的劳动成果再次进入资本循环,成为新一轮生产的生产资料。在这一资本循环中,“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14]116}质言之,一旦生产资料进入资本逻辑运转,便在运动中同时被消费和生产。然而,在资本逻辑的循环中,劳动者仅消费自身的劳动力,促使劳动对象的消费转化为劳动产品的生产,却并未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劳动者自身的生产”^[15]。由此看来,劳动者的生产外在于资本逻辑循环,有其相对自由的自为性。劳动者自身的生产即人的发展,是人的发展需要得以满足后的结果。由以上论述可见,劳动力是资本逻辑生产的出发,但却无法以发展了的形态重新返回这一系统。于是,人的发展构成了资本逻辑运动的缺口。

(二)工人发展的需要

人的发展需要得以满足,依赖于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是人的生存需要首先得到满足,人们不用耗费过多时间用于生计。该条件的实现,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其二是自由时间的增加。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时间被认为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10]306}。质言之,自由时间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必要条件。在自由时间中,个体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有效调整并妥善处理自身同他人、社会及集体之间的各种关系,通过交往在他者中反观自我、丰富认同,进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同时,个体还能够尽情享受各类精神文化产品以提升智力水平,或参与体育锻炼活动以增强体能。这些自由时间内的享受,同样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的支撑。关键在于,自由时间的延长建立在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减少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缩减又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自由时间的延长同样依赖于生产力的提高。综上,人的发展需要的满足,以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为前提,这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人的全面发展,还是美好生活需要,最终都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三)资本逻辑的困局

显而易见,资本的增殖同样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物质财富的产出才能不断增加,资本增殖规模也才能随之扩大。而从生产力的本体论来看,劳动者作为生产过程中最活跃的要素,居于主体地位,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皆由劳动者的对象化活动创生而来。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取决于人的发展。而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发现,人的发展需要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是互为前提的,然而,资本逻辑在此陷入了一个难以克服的二律背反:它既需要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而这一发展又以人的发展为前提;但其自身增殖的逻辑,又在根本上限制和扭曲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内在矛盾,构成了资本逻辑无法自我突破的根本困局。

让我们回到资本的唯一逻辑上来。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为人的生存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资料,但它是以损耗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为代价的。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必然采取一切手段压缩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使其转化为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导致劳动者缺乏满足非物质性需要的基本条件,抑制其发展空间。然而,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把劳动者的发展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否则它的增殖欲望将无法得到满足。于是,资本一方面需要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劳动者获得一定发展,以提高生产力。这种既依赖又压制人的发展的矛盾,并非外在制约,而是深植于资本逻辑内部的二律背反。这意味着,唯有在资本逻辑自身的运行进程中,这种内在的对立才有可能被突破。所以,待资本逻辑的物质生产活动足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后,生存需要将为首要需要降为次要需要,非物质文化需要——即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内容——将上升为首要需要。同时,当人的发展受抑制达到临界点、资本逻辑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要求之时,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范式,才真正具备了现实出场的可能。

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出场的现实依据: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如前所述,在资本逻辑推动下,物质财富的积累已使我国摆脱了绝对贫困的生存阈值,人的发展理应成为当下经济发展范式的核心目标,充分践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相较于资本逻辑的纯粹逐利性,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人文性质,即通过满足人的发展需要来实现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本逻辑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主导,生产主要服务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个体利益。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家得以支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无偿占有其创造的剩余价值。此时,劳动者被降为物一般的要素,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一同被纳入资本的运动逻辑,形成一种以资本家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具有排他性的生产机制,即个人独占物质财富而非社会共享,其实质是个体需要的满足以剥夺他人需要的满足为代价。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劳动力所有制为核心,使物质生产活动服务于广大劳动者的整体需要。生产资料由最广大的劳动者所有,实现其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共同化。也就是说,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实现共同体及其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为宗旨,不再是少数人追求私利的工具,而是真正成为满足社会大众需要、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因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物质生产活动能够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中华民族朝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持续迈进。

(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于满足科技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出场

全球科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面临的科技创新困境,突出表现为外部技术霸权与内部创新体系脆弱的双重压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技术垄断国家通过封锁核心技术与关键设备供应,企图固化全球创新体系的等级秩序,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持续的控制权,迫使中国陷入技术依赖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还不牢固,创新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在一些领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16]24}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依然面临诸多“卡脖子”问题,国内科技创新体系也面临诸多挑战。如,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尚未建立起高效协

同的知识流动机制,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存在知识创造与成果转化不协调、不匹配等问题;跨学科融合面临学科壁垒,传统学科的知识体系难以适应新兴技术发展的需求,而交叉学科在方法论层面尚缺乏有效的范式整合能力;技术迭代周期快于知识沉淀速度,导致核心技术攻关面临知识储备不足的瓶颈。

从本体论角度看,科学技术绝非外在于人类主体的客体化存在,而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呈现,是人文精神在物质领域的具体延伸。既有的物质文明成果,往往以科学技术的物化形态为载体,体现为“文化经济化”的过程。正是基于对科技自主创新的迫切需求,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应运而生,以满足科技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于满足历史文化遗产与文化产品消费的需要而出场

市场经济下,追求同质化、效率化、标准化的机器生产挤压传统手工艺市场,耗费时间长、不可机械化、生产效率低的传统手工艺正面临失传或销售困难的挑战。这些手工艺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因此难以得到有效传承和创新发展。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重要一员,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和文明瑰宝正是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学者指出:“文化需要的满足是维系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纽带,能增进人的文化认同。”^[17]消费者在文化产品消费过程中获取历史文化知识、感受东方美学、享受艺术滋养,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正是通过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底蕴来赋能文化产品创造与发展,这一点在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文化产业中尤为明显。其目标在于提升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既扩大市场影响力,又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深刻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不仅关注经济效益的实现,更重视文化的深度传承与创新,努力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从而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与文化消费的双重需要。

(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于满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需要而出场

物质生产活动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中介,不仅不可或缺,在根本上更是一种人对自然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自然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作用对象,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既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人与自然割裂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这种二分法导致自然被置于人之外,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单向支配关系,其索取与消耗仿佛与人类自身无关,进而构建起以效用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理性。在工业化进程的驱动下,技术理性主导的生产方式将自然简化为可无限攫取的物质仓库,通过机械化的资源开采和线性化的物质代谢,持续突破生态系统的再生阈值与承载边界。在此过程中,人类活动不仅改变着自然界的物理形态,更通过碳排放倍增、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物跨介质迁移等连锁效应,重塑着地球系统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路径。随着生态破坏的累积效应逐渐显现,原本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生态系统陷入功能退化与结构解体的恶性循环,人类的生存家园面临严峻危机。

鉴于自然资源有限性与人类文明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人类亟须寻求一种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经济发展范式。这强调,通过知识要素的深度渗透重构生产函数,使智力资本、文化资本等非物质要素逐步取代物质投入的主导地位。此时,技术进步通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实现物质减量化,创意设计借助增值文化符号而降低产品物质依存度,共享模式凭借使用价值复用延缓资源消耗速率,三者共同构成减缓生态压力的路径。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应运而生,以满足人民对美丽生态环境的需要。

(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于满足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出场

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经济学,容易加剧社会阶层的“内卷”并导致人际关系趋于紧张,同时诱发广泛的诚信危机。在此类经济学理念的导向下,生产共同体将劳动者视为抽象的“理性经济人”,仅依赖外在利益驱动机制维持运行,依靠物质化手段维系内部秩序。众多实践经验表明,这种机制在忽视人文道德约束的环境下,只会促使劳动者逐步异化为受短期利益所驱使,缺乏信念、诚信与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动物”,并引发人性异化、物质欲望过度膨胀、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危机。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则聚焦人与

人之间的现实处境,强调以人文关系代替物的关系。它主张以与经济生产相符的道德规范和内在机理助推经济发展,旨在建立一个高信任度、低交易成本的经济环境。当社会的信任度高、道德规范健全时,企业和个人能够在更透明更公平的环境中开展经济活动,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此外,在生产组织内部,健全的道德准则能够降低对非理性行为的管理成本。现实中,由于人的理性有限,往往需要依靠高成本的外部制度进行约束。然而,受机会主义的影响,制度管理难以覆盖所有经济活动,即使能够在每个环节进行监督,其成本也往往难以承受。因此,需要以“文”化人,激发个人理性,并与制度管理相结合,提升生产组织的整体效率。道德作为内化的规范机制,通过人文传统与社会舆论外化为行为准则,最终实现经济行为的有序化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化。

五、结语

人类历史按照“需要—生产活动—需要的满足”的框架展开,因而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人的需要不断被满足的发展史。人的需要具有多层次性,通常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便会转向更高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需要,而这些需要的满足则依赖于人文因素的融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已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日益趋向对美好生活的全面追求。因此,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发展范式需要突出人文色彩,通过作出相应转变,来适应这一更高层次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价值得以消费,同样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并非单纯依靠精神。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显著区别于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生产范式。

资本逻辑下的物质生产以物的增殖为目的,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成果。在时间层面上表现为,尽可能地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而劳动者的自由时间是其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由时间的增加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的。同时,劳动者的发展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质言之,人的发展需要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互为前提。但由于资本逻辑的介入,这种互为前提的发展需要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当物的增殖已足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而人的发展濒临危机时,真正聚焦于“人”的经济发展范式才可能应运而生。

资本逻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运行,其生产目的在于满足私人需要,个人的社会权力以物化的形式呈现,导致“物的逻辑”压倒人的逻辑。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学以劳动力所有制为主导,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物质生产,致力于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更注重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强调资源共享与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存需要普遍得到满足的背景下,人民开始产生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正是为回应这些需要而生,旨在满足各项需要:一是推动科技高质量发展,满足解决“卡脖子”等关键科技领域难题的需要;二是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创新,满足人民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三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四是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应对日益复杂的人际交往需要。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范式,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更高发展形态的深入探索,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途径。在如此“出现新的需要—经济发展范式转换—新的需要得以满足”的循环下,人最终得以实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王德峰. 马克思社会概念的本体论涵意[J]. 学术月刊,1991(1):1-6.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93.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8.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 [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桑明旭. 加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1-8.
- [1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党建,2021(7):4-9.
- [13] 新华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课题组.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发展范式研究[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1-19.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梁豪. 论资本逻辑的困局与人本逻辑的未来性[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8):53-58.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7] 叶胥,毛中根. 文化需要满足与文化自信强化:有机协同及政策取向[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54-62.

Emergence of New Era Humanistic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Needs

LIANG Hao, WANG Xuan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Needs demonstrates contextual duality within different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eds manifest as the primal driver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facilitating dynamic adaptation in human-nature relations. In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 employs the concept of needs to reveal the antagonism between workers' developmental needs and capital's accumulation imperatives under capitalist logic. Building on thi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emergence of New Era Humanistic Economics follows a tripartite generative logic. Historically, it responds to the evolutionary interaction between escalating human needs and economic paradigm shifts, where aspirations for better living catalyz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oretically, it addresses the antinomy with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paradigms betwee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human alienation, proposing that material abundance enables transcendence of this contradiction. Practically, grounded in China's achievement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t systematically addresses contemporary demands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ecological harmony, and social cohesion. This tri-level analysis constitutes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a humanistic economics paradigm aligned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New Era Humanistic Economics; Marx's Theory of Needs;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emergence

(责任编辑:魏 霄)